

燕山诗话

罗孚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燕山诗话

罗孚 编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燕山诗话/罗孚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12

(罗孚文集)

ISBN 978-7-5117-0693-5

I. ①燕…

II. ①罗…

III. ①诗话-中国-当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0703 号

燕山诗话

出版人 和 龔

策 划 高 林

责任编辑 叶 芳

编辑信箱 yefang58@gmail.com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11239(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66130345(网络销售)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45 千字

印 张 6.625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我行我素我罗孚

在网上搜索“罗孚”这个词，往往可以搜到的是一个名贵的汽车品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罗孚”，却是一位文人，一位有名的文人，一位颇有来历的文人。

罗孚是他的笔名，他本名罗承勋，1921年生于广西桂林。

他是一位报人。1941年在桂林参加《大公报》，从练习生做起，先后在桂林、重庆、香港三地的《大公报》馆工作，一共干了41年。徐铸成说他文品皆优，胡政之也说他头脑清楚。他做到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和香港《新晚报》（即《大公报晚报》）的总编辑，还编过《大公报》、《文汇报》的《文艺》周刊和《海光文艺》月刊等。

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位报人。

1947年，他作为进步知识分子，参与了重庆地下党的理论刊物《反攻》的创办和编辑工作，《反攻》的领导人正是当时还没有被称作江姐的江竹筠。1948年，他在香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长期在廖承志同志的领导下工作，廖公称他作“罗秀才”。

上世纪50年代，叶灵凤寓居香港，在他和朋友们的鼓动和帮助下，为左派报刊撰文，一时间凤兮归来，霜红正晚。70年

代末，聂绀弩从沁园回到家，一副病躯，满脑子都是诗。他在香港以野草出版社为名，出版了聂诗《三草》，如今，老聂的诗成了一代人的心灵史。更早一些时候，查良镛还是一位编辑，写了几部电影剧本也没找到感觉，他鼓励这位同事在《新晚报》上开天辟地写武侠小说，以后，我们就看到了“金色的金庸”；当然，还有再早一些的梁羽生。再晚一些时候，他在《读书》杂志上写文章介绍香港作家，一篇《你一定要看董桥》，使得这位经济学出身的编辑，更上层楼，名满大江南北……。

其实他还是一位作家，首先是一位散文家，他把发表过的文章汇集成册，有《风雷集》（1957）、《西窗小品》（1965）、《繁花集》（1972）和《香港文丛·丝韦卷》（1993）。作为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他不遗余力地为主旋律讴歌，似乎其中也有那么一点“风花雪月”。有人称他是香港左派文化阵营中的“一支健笔”，他却说，早年的文章不忍卒读，“四十多年来我写了不少假话，错话，铁案如山，无地自容”。萧乾评论说：“这是巴金的《真话集》问世以来，我第二次见识到这样的勇气，这样的良知，这样的自我揭露。”

1982年起，由于一个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原因，他在北京蛰居了十年。从此，罗承勋改名为史林安。可是，黄苗子和郁风一定要管他叫“史临安”，临安者，南宋偏安之地后来的杭州是也。

北京十年，其实不是蛰居，是谪居。走了罗孚，来了“柳苏”。柳、苏，当是柳宗元和苏东坡。他说，我安敢自比柳、苏，只是取了其中的贬谪之义罢了。话虽这么说，事实上他成了“专职”的作家，也迎来了自己创作的高峰。这期间，他写了介绍香港形形色色的《香港，香港……》（1986）、《香港作家剪影》（1992）、

《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1992）和《香港文化漫游》（1987），描绘了一幅九七以前香港文坛的画卷，他肯定香港是有文学的，也有很多好的作家。他写下了二十余万字的散文和随笔，见诸大陆和香港的报刊。他还读诗、写诗、解诗，自己写了许多首旧体诗，编辑了聂绀弩的诗集，写了《燕山诗话》（1997）。柳苏比起罗孚，又多了一点冷峻和老辣，好像还有一点忧伤和无奈。

当然，他还不止是写作，还有交游。和他作忘年交的有：沈从文、夏衍、冰心、启功、钟敬文，他的密友还有舒芜、舒詈，和他一起吟诗作赋、唱和作答的有：黄苗子和郁风、丁聪和沈峻、吴祖光和新凤霞、杨宪益和戴乃迭，还有黄永玉、王世襄、范用、邵燕祥……，这些也都成了他的创作题材。他为新组建的三联书店写作并出谋划策，沈昌文曾说：“柳苏先生熟谙港人港事，许多人、书、事都是他亲历、亲闻。文章不仅生动而富文采，而且具有史料意义。他还帮助我们扩大了自己的出版范围，开辟了一条通往外面世界的道路。”

1993年，他回到了香港。他说，我对香港，未免有情，我恋香港。余年无多，“岛居”最久。这些年，他又在报刊上以“岛居杂谈”和“岛居新语”为栏目，写了大量的散文和随笔。年事虽高，笔锋仍健。出版了《文苑缤纷》（1997）、《丝韦随笔》（2007）等书，还编了一个专辑《香港的人和事》（1998）。

主持《新晚报》后，他以“罗孚”登记了身份证，也不再用其他笔名。几十年来，他用过十几个笔名。也许是留恋家乡的山水，他用过“石发”；抗战时崇尚罗斯福，同事们管他叫了这个“花名”，他就做了“史复”和“罗孚”；写革命文章时是“封建余”；办报时作“辛文芷（新闻纸）”；抗战时期在重庆替

宋云彬主编的《民主》周刊写“无花的蔷薇”专栏时为“丝韦”、上世纪 60 年代为文时又称“吴令湄（勿令迷）”。当然，还有“柳苏”。现在，罗孚，既是本名，又是笔名。

罗孚“岛居”以来，他的作品似乎也被“岛居”了起来。今天，我们整理出版罗孚的著作，就好像迎接一位长者的归来，也应了聂绀弩写给罗孚的诗：“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罗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日

序

我的北京的十年是诗的日子，不是日子过得像诗，而是颇有闲暇读诗。因此读了一些诗集，也想方设法读了一些还没有形成集子的当代人的诗。

我是不薄新诗爱旧诗，是新旧体诗都爱读的，读得多一些的，还是旧体。

年轻人多写新体诗，老年人爱写旧体诗。一般总是年轻人才爱写诗，但“文革”后，老年人写诗的特别多，新文学家写旧体诗的特别多。

“诗穷而后工”，“文革”穷且乱。诗就更多了。

我不仅欢喜读诗，也欢喜读诗话。这是早年就养成的习惯。一部《唐诗三百首》，一部《随园诗话》，读得熟了。

读得多，自己也就想写，既写诗，也写诗话。写诗是为了抒情，写诗话是为了记下好诗，可以时时翻阅，也可以随时公诸同好，让也欢喜诗的朋友可以借阅、传抄。

我认识和结交的新知旧雨，从事新文学的比较多，旧学宿儒较少，因此，也就接触到比较多的新文学家的旧体诗。

我写了一些诗，自知水平不高，秘不示人。写了一些诗话，记的是别人的诗，不会妄自菲薄，相反，却有了宣之于众的冲

动，就把它们送回香港，拿到《明报月刊》发表了。

在当时来说，我还没有这样发表的权利，却有发表了就可能出麻烦的危险，因此用了一个笔名，由编者随便赐赠，这就是“程雪野”，据说主要是一个“雪”字，不是雪野风光，是朋友的好意，望我昭雪。

当我还没有阅读和写作的自由时（当然更没有发表的自由），我在大都北京的一个胡同里幽居，在一个偶然的会中我知道了胡同的名字，有条件恢复自由后我才知道那是《燕山夜话》的作者邓拓居住过的地方。尽管事过境迁，我还是以此为荣，喜在心里。

当我有机会写作、发表的时候，第一个（没有第二、第三）也是唯一想到的，就是给它加上一个《燕山诗话》的名字了。

遗憾的是这些诗话却没有谈到邓拓的诗和别的一些我喜爱的作者的诗。原因多种，有的就是找不到。我曾经找过朱光潜的诗而无所获，他谈诗谈得那么好，但据说自己的诗诗味却不怎么样，我有些不愿意相信。

遗憾的是有些已经写了的却没有收进这本诗话中，也是原因不一或者根本没有什么原因。

老实说，我这些诗话没有什么意义，有意义的是有关的诗篇，也提供了一些诗篇写作的时代背景。

北京燕山，夏日将临，不知为什么，我却像黄仲则般有都门秋思了。

一九九七年三月

目 录

001 / 序

001 / 从胡乔木到乔木

010 / 夏衍和猫的情谊

014 / 从俞平伯到胡风

025 / 冯雪峰十年祭

034 / 空前绝后聂绀弩

042 / 王力文革五哀诗

050 / “文章倾国”三家村

059 / 冯友兰诗论毛泽东

067 / 秦似悲田汉哭孟超

076 / 周作人已经平反了？

087 / “饱吃苦茶辨余味”

097 / 书愤放歌吴世昌

106 / 精通洋文土诗人

116 / 杨宪益诗打一缸油

124 / “生正逢时”吴祖光

133 / 陈途冬十步话三分

- 142 / 碧空楼上探舒芜
152 / “从来冠冕总堂皇”
161 / 铁骨铮铮邵燕祥
171 / “至今人厌说秦皇”
177 / 黄苗子“青蝇拍后”
187 / 玉尹老人狱中诗
197 / 《燕山诗话》后记

从胡乔木到乔木

在含冤三十多年之后，武训也总算得到了公开的平反了。

严格地说，还只是半平反，或“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平反。

有人干脆就不说“平反”，而只说是“纠左”。

“纠左”？谁的“左”？毛泽东。谁在纠？毛泽东当年的秘书胡乔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今天在这里否定了五十年代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他是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成立大会上做出上述表示的。”新华社这么说。据说，胡乔木指出，一九五一年对《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不但不能认为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

尽管这两个“不能”说得有些吞吞吐吐，却还是被认为是
对武训的否定之否定了。

事实上，这只是对《武训传》批判的否定，还不是直接为武训平反。当年武训被斥为“清朝统治阶级的奴才”、“农民起义的对头”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这三项大帽子还没有正式摘下来。

这三顶帽子——“奴才”、“对头”和“帮凶”是跟着一个

“主义”而戴上的：“投降主义！”毛泽东在中南海看《武训传》时，吐出了这句话，未终场即去。也可以说是终场，他这一走，电影就放不下去，完了。

武训也就完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就跟着展开。主持其事者之一，就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胡乔木。尽管“犹抱琵琶”，今天由他来否定这一场批判，就多少有些自我批判的味道，尽管他没有提到当年自己如何如何，这也许由于并不是在作“全面的评价”的缘故吧。

陶行知也就完了。由于他生前推崇武训的办学精神，也可以说他就是有着“武训精神”的教育实践家。自从《武训传》挨批，死去了的陶行知也就三十多年抬不起头来，他也就成了连带被否定的人物，武训的异代连坐犯。这也正是为什么胡乔木要在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成立的时刻，来否定对《武训传》的批判的缘故。

其实，第一个半公开为武训平反的，不是胡乔木，而是万里。万里也不是在一九八五年六月和老同学张绍虞谈话时，才为武训平反，这场谈话一开始他就说：“我已经在全国教育会议上两次给他平了反嘛。”（见《明报月刊》一九八五年十月号《武训平反问题三文件》）。这个“已经”，不是一九八五，而是一九八四。按说，在有关会议的文件上有记录，不过一般人看不到，因此只能算是半公开的平反。

万里的半公开，不等于胡乔木的半遮面。他是毫不转弯抹角地说，不能把武训称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农民阶级的投降派”的。而且，他毫不含糊地说，要平反。虽然不知道他还具体说了些什么，比起胡乔木的话来，他是快人快语了。

虽然是快语（万里）和不够爽快之语（胡乔木），都了无

诗意。

但不可不知，胡乔木却是个诗人，正和毛泽东是诗人一样。

不“全面评价”对《武训传》批判的他，在诗词的创作上，是比毛泽东更全面的。他不仅写旧体的诗词，还写新体的诗，简称新诗的诗。他不仅采用中国古典诗词的格律，写新体诗时，还用西洋诗的格律。

记得在“文革”以前，《红旗》杂志曾经用过整整一两页的篇幅，刊出他好些首词，都是格律谨严的，其中有咏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霹雳一声春，风流天下闻”的句子；也有咏西湖边上拆掉那些伪托的古代英雄美人墓的“如此荒唐”的句子。

这两年，地位高了，他的旧体诗更在《人民日报》主要的版面、显著的地位，新闻般地刊出了；而副刊上，就刊出他的白话新诗。

据说，他在爱写旧体诗的胡绳处看到香港出的聂绀弩的旧体诗《三草》，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有意出新的补充修订本。就主动上门，拜访病榻上的这位老诗人，又主动表示要替这一《散宜生诗》写序，在序中赞扬这是“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诗史上独一无二的”。

这件事很表现他的诗人的性格。如果能更多地表现就更好了。

胡乔木的送序上门，据说曾经使聂绀弩有过一点顾虑，他怕不知道的人以为是出于他的主动，是他在走上层路线。熟悉他的人当然明白，他不是这样的人；而不熟悉的人，好像也没有这样的误解。他这才心安理得。

聂绀弩又是怎样的人呢？有一位年轻的作者，说他是“躺

着干活的人”。

七八年了，从山西的监牢回到北京的居所，他就一直是躺在床上，近年的一些新作，就是这样躺在床上写出来的。其间他也参加过文代会议和政协会议，而他的参加，只不过是从小家里的床上转移到会议宾馆的床上，还是躺着，不开会而自有会，会见朋友。

八五年六月间那首《吊胡风》的诗，就是躺在家里的床上写出来的。

八四年二月间那篇《谈〈金瓶梅〉》的文章，也是躺着写成的。写作的时间似乎比文章的内容更使人感到兴趣，因为那正是“清除精神污染”之风吹荡着的时节。

文章一开头就先在洁或不洁上做文章：“人多不谈此书者，因为其中描写多不洁处。书固不洁，但不谈亦不能使之洁，更不能自洁之。且科研之下，不分洁否。凡医院均有检验不洁物者，然则谈谈《金瓶梅》，亦未必志在自求不洁，或使人不洁”——也就是并非志在使人精神污染。

文章的结尾是聂绀弩的坦白认错。他说，鲁迅在《答徐懋庸》那篇文章中，有一句提到“像聂绀弩犯的错误”，但没有明言是什么错。他说，错在他当年写过一篇文章《关于世界文库翻印古书》，一攻击了郑振铎，二攻击了翻印《金瓶梅》是“翻印淫书”，而且不以为是世界名著。第二点今天看来真是“无知瞎说”了。

承认《金瓶梅》有不洁的一面，但肯定“它客观上多少揭露了人中之兽、美中之丑的部分，使人知道了兽与丑，从而转悟到人与美，或即人的觉醒的前奏的一部分”。这就是聂绀弩的一个主要论点。

有人于是写了一首访绀弩的诗：“京尘几辈同炎凉，八二芳龄一老枪；冷眼对窗看世界，热肠倚枕作文章；声名灌耳麻雷子，品藻从头屎克郎；莫说金瓶净污染，千秋悲剧属娘行。”聂绀弩八四年“年方八二”，还抽烟，可以说是老枪，尽管抽的是香烟而不是什么鸦片。倚枕作文，是躺着干活，不作文的时候，眼睛时时瞧着窗外，看着吟着“窗外青天两线交”。麻雷子是一种鞭炮。屎克郎是一种小虫，爱在肮脏的粪土中穿来穿去，近年澳洲有人研究，发现它居然是益虫，因此对它也就刮目相看，“品藻从头”了。这一句可能和聂绀弩并没有什么关系，不过作诗的黄苗子要拿屎克郎和麻雷子作对、要拿品藻从头和声名灌耳作对罢了，而且自鸣得意，自认是巧对。至于“莫说金瓶净污染”，那才是赞聂绀弩热情大胆写出这篇引人注目的文章，以这赞声表示对“清除精神污染”的做法作了微微的讽刺。

杨宪益见了这诗，和了一首：“从来客去即茶凉，说理书生怕见枪；举世皆批人性论，羨君先读好文章；愿逢纵欲河间妇，不作无能武大郎；潘氏瓶儿皆可爱，小生一向重娘行。”

原诗是游戏之作，和诗就更是游戏之作了，有些话不必认真，但字里行间，却可以看到对“清除精神污染”的做法有更大的讽意。

一开始颇有一点大搞运动之势的“清除精神污染”，后来终于不得不收敛而纳于正轨了。不过，因此而下台的胡绩伟和王若水尽管没有受到更进一步的“治理”，却也没有恢复原来的位子。当然，他们是用不着恢复名誉的，他们的名誉不仅没有因此而被贬低，反而是更高了。

据说，王若水关于人道主义的文章，包括对胡乔木文章的反驳，不久会有书出版。胡乔木表示对他自己的文章是理所当

然的可以争议。又据说，他还对王若水的生活表示了关心。如果一开始迅雷疾雨少些，关心多些，那就好了。

至于《金瓶梅》，在不那么运动式的“清除精神污染”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洁本在八五年终于发行，并没有加上“内部发行”的标志。从书中的《标点说明》可以看出，这书在一九八〇年就校勘、标点、删节好了，经过了四年多的等待，才能出书。由于只印了一万部，书出而引起有人愿以十倍于十二元定价的数目以求必得，也就不足为异；但料想看完了洁本，他们不免要感到失望。洁本真是洁，你想从那里面接受一下“精神污染”也不可得。不过，它拖到这样的时节出现，总不禁使人要对那些“清除精神污染”的猛士们发出会心的微笑。

《金瓶梅》洁本的出版是春天的事，此刻是冬天了，人说冬天有寒流，拿笔杆的人又小心谨慎起来，虽然还不能说是戒慎恐惧。

乍暖还寒，乍寒还暖，暖暖寒寒，寒寒暖暖，这就是天道的循环么？如果否定对《武训传》的批判使人感到暖意，这以前，胡风死后的冷冷清清却是使人感到寒意，而此刻的气候似乎更寒一些，但愿未来会有新的暖意。

此刻，不知怎的想起了另一位乔木，真正姓乔的乔木，乔冠华，而不是姓胡的乔木，胡乔木。也许是因为胡乔木而想起他，也许是因为联合国纪念成立四十周年而想起他。

他是代表新中国出席联合国会议的第一位外交部长（出席时还只是副部长）。那是十四年前的事了。

而在四十年前，他是和胡乔木被称为南北二乔的。两人都是能文之士。当时他用的乔木这名字，后来在一九四九年从香港回到北京，为避免和胡乔木混淆，才又用回乔冠华的本名。